

覺醒

馬勇講史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覺
醒

馬勇講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觉醒 / 马勇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

(马勇讲史)

ISBN 978-7-5133-2385-7

I. ①觉… II. ①马… III. 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 IV. ①K25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6739 号

觉醒

马勇 著

策 划: 彭明哲

责任编辑: 李文彧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阳洪燕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70mm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7年2月第一版 2017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385-7

定 价: 7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的学术起步^①

承蒙彭明哲总编辑，以及东方出版社、新星出版社诸位朋友的好意，我在过去近三十年间有关晚清历史的几本小书有机会汇成一个小系列出版。编定之余，我写了一篇短序：

我的专业本为中国学术史，读书期间主要精力用在先秦两汉。那时根本想不到后来几十年竟然会将主要精力用在了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史。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那时的分配制度。我被分配至近代史所，思前想后，也不能不在近代史领域做点事情。这是我过去二十多年致力于晚清史的缘故。

晚清史，是前辈学者下过不少功夫的领域，但相对于我那

① 马勇撰“晚清四书”自序之一。

时比较熟悉的古代史，近代史许多问题在那时还没有人触及，时间的原因，时代的原因，总而言之，三十年前的中国近代史与古代史比起来，犹如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这样说，主要是就细节而言，如果从大的框架看，尽管这段历史刚刚走过，但学术界在那时还是形成了许多相异乃至相反的看法。这也是近代史的魅力所在。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近代史教育，是典型的、正宗的革命史。我的印象中，近代史老师那时最习惯的口头禅之一就是“我党”“我国”如何如何，不管自己是不是中共党员，大家都有一种主人翁的自觉。至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地主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等，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时经常使用的概念、词组，深入骨髓，历久不忘。

假如不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便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捕，中国开始“新长征”，重启现代化建设（那时叫“四个现代化”），“革命叙事”的格调大约都不会变，相信似乎依然会沿着毛泽东的路走下去，当然会在毛泽东政治变革的基础上增加些经济要素。

三中全会让中国历史彻底改变。这次会议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方向，这个方向不再是沿着阶级分析方法看待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不再是不兼容的制度，社会主义发展一定要全面继承人类文明的成果，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利用资本主义手段、方法发展中国，是那时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共识。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将先前几十年想象的、浪漫的社会主义拉回到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由此，近代史叙事模式面临挑战，许多人与

事，也都面临着重估。

我个人在那时印象最深的是对中国资产阶级，以及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由这场讨论，先前几十年风靡全国的“革命叙事”打开了一条裂缝，渐渐地，研究者普遍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革命，除了制度变革，也有一个建设、发展问题，因而对近代中国历史上改良主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先前比较负面的人和事，都有了不同思考。我在近代史学术领域的进入，就得益于这个时机，这个切口。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政治上的变化，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政治保守主义成为学术界主旋律，受此影响，我那时比较集中研究了严复、梁漱溟等提供的保守主义方案，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实践。稍后，机缘巧合，我承担了近代中国通史集体项目中的甲午至辛丑时段，使我不能不从政治史视角重新思索中国人在那时的追求、实践、问题，晚清帝国为什么从“先发优势”的洋务新政一发不可收拾，维新、变法、排外、新政、宪政，直至清帝国结束。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逻辑，各派政治力量、思想家、政治家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方案，实践与理想，历史与逻辑，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一个老大帝国不是通过变革获得新生，而是付出了一个王朝终结的大代价。过去二十几年，我的主要思索大致都围绕着这些问题，试图给出合乎历史与逻辑的解答。

为了解惑，从那时起我相继承担并完成了近代通史“从甲午到辛丑”的写作，“维新时代”“义和团战争”的写作，这些写作，有的已经出版，更多的，自认为还有修正空间，因而只是结项，并没有出版。我一直期待退休后集中时间静下心来重写这几个课题。

主要的研究成果没有出版，但由于机缘巧合，由于出版界朋友的热心，过去十几年我也在这个领域出版了几本适合于非专业读者阅读的作品。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当今中国如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体制内的研究者不能不为体制而写作，毕竟要完成工作量，要考核合格。另一方面，读书人毕竟不只是为了职称、待遇，读书、写作，既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为大众、为社会奉献的责任。这是我这些年，确切说是评完各个层级的职称后自由写作的心态、追求。我觉得应该为自己的兴趣而写作，为更多读者而写作。

承出版社朋友不弃，这几本小书都曾在各出版社出过初版，或修订本。这一次，新星出版社朋友建议将之汇集起来，作为一个“晚清小系列”。

我过去曾经写过一篇《作为艺术的历史学》短文，大意是说历史是一门主观性极强的学问，接近于艺术，可以把玩，必须想象，因为无论历史资料如何丰富，史料有意的无意的被销毁，尤其是关键史料往往并不归档，重要历史人物往往利用“后死者的话语霸权”影响历史书写。由于这些因素，历史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学问，我们无法穷尽历史真知，但历史学家有责任讲述一个有根据有思索而又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衷心感谢先前出版这几本小书的出版社，感谢新星出版社的朋友，感谢不离不弃的读者诸君。

2016年8月11日星期四

短序写完后，我就发给了责任编辑李文彧小姐。文彧是我在东方出版社“作品集”的主要编辑，合作了一段时间了，愉快、轻松、友好。过了几天，文彧告诉我，新星出版社彭明哲总编辑看了我写的短序，他

希望最近和我见个面，再聊聊。

8月22日，中午，我如约赶到微商故里。明哲兄在正式喝酒前很认真谈了他的建议，他希望我将这篇短序废掉，仿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作一长序，系统清理自己过去几十年晚清史研究的心路历程，以为年轻一代参考。顾颉刚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渺小如我如何敢仿其历史学名篇瞎编滥造？所以在最初的反应，我是无论如何也以为万万不可。

几杯酒下肚后再仔细想想，明哲兄，以及当天在座的秦千里兄说的也有道理，毕竟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三十年，即便没有经验，也有挫折。将自己的体会、经历写出来，即便不为年轻一代参考，也可为当代学术史留下一点史料。

于是，有了这篇文字。

“批林批孔”是我的学术起点

听了明哲兄的建议，我并没有急于动手，一方面往回找点资料作为凭借，另一方面静下心来回思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差不多二十天过去了，我方才找到一点感觉，觉得可以动手写这篇文字，也觉得要想说清楚后来的想法，还是得从头开始。这大概属于历史学的职业病。

先说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为纪念邓小平诞辰，我应约为一家媒体写了一篇文章，主要从自己的经历，谈邓小平引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意义。或许是因为行文需要，或许是为了对照，既然说走出毛泽东时代，就不能不说毛泽东的问题。结果，一位网友在那篇文章后留下了七八篇批评文章，可惜我并没有在那个网站上注册，而且那篇文章是这家网站独家约稿，网站编辑也没有告诉我这些留言，所以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些留言。大约是我的不回应惹恼了这位网友，他毫不客气地向我

的上级，乃至我的上级的上级写信举报，大意指责我反毛。这种举报过去几年确曾给我带来许多困扰，但我理解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网友。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按照过去的话说，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从出生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红色江山、共产主义接班人，毛泽东的语录早已渗入我们这一代的骨髓。假如不是后来的读书生涯，我一定也与现在许多崇拜毛泽东的人一样，不会有其他想法。一个例证就是我身份证上的生日，就是毛泽东的生日，这并不正确，而是上大学建档案时选定的。我来自农村，使用记时都是农历，从来没有换算过阳历。那时也不是很好找“万年历”对照表，因而以为接近，就将毛泽东的生日当作自己的生日。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个别例外，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反潮流”，绝大部分都曾经是毛泽东的崇拜者，顺着潮流走，发自内心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尽管这些人没有几个与毛有过直接接触。

我的老家在安徽最穷的濉溪，被当地稍有知识的人誉为安徽的西伯利亚。小时候，濉溪属于宿县，就是现在的宿州；后来属于淮北市，也是淮北唯一一个市属县。

与同龄许多学者相比，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早期，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实在说来，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像同时代的城里人，有机会学习那么多古今中外名著。我们那时上学，毫无目标，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让孩子识点字，平安度过儿童时代；对于学生来说，没有升学压力。一个村庄想也不敢想会出个大学生。特别是“文革”开始，废止高考，成绩好坏，一律平等。即便后来出了“工农兵大学生”的创意，我们村也有几个同龄的入学，但上大学基本上与学习成绩无关。所以回想青少年时代，我没有后来从校门到校门一代学子的辛苦，我一直处于“快乐上学”阶段，没有任何人为压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底层社会出身，没有见过荣华富贵，并不知道艰辛是艰辛。

中学毕业，那时并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严格的户籍管制，不仅不存在外出打工，甚至遇到荒年要外出讨饭也很难被允许，必须开具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当然，我们那儿没有外出讨饭的习惯，我小时候倒是经常见到不远处的凤阳等县的职业乞讨者，只要秋收过后，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回来了。多年后，看到研究皖北乞讨者的书籍，我特别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那儿，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当兵。高中毕业后第一年，我因为一个小小的毛病，体检不合格。我的很多同学那一年参军去了锦州，几年后参加唐山大地震救灾。我没有去成锦州，第二年，我参军去了杭州警备区。这个经历，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后来研究义和团来源时，以为义和团在那时能够闹起来，战后遣散，或解散，或逃亡的官兵应是一个因素。我的这个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自己在军营中的经历。老话说好铁不打钉，好孩子不当兵。军营就是一个大熔炉，一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个熔炉里一定会迅速改变。军营生活越久，越难以回到土地，自古以来的流民，其间总能看到军人，或退役军人的影子。

杭州城区三年多，我只是看见了杭州的繁华，并没有进入市民生活。但这个花花绿绿的杭州，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小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场灵魂的震撼，开了眼界，知道除了家乡，还有城市，还有世界，还有那么多好地方。

军营生活真正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运动。军队现在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们那时，每天的工作除了完成站岗执勤任务，主要就两件事，一是连队的副食品生产，养猪、种田，支农“双抢”；另一件事就是学习，我们简直就是文化兵，几年时间，确实有很多军事训练，但很少真刀真枪，印象中，实弹射击并没有几次，大量时间就是理论学习。这是我们军队的优势，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痛苦不堪。

毕竟我那时算是高中毕业之后入伍的，虽然我们在学校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相对而言，高中毕业在那时的军营就是不小的知识分子了，因为更多士兵小学都没有读完。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我愿意从军营开始说，主要就是因为没有那几年军营生活，没有批林批孔运动，没有学理论，我的人生不会如此，更不会去读历史，研究历史。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理由现在看来并不是很充分，至少林彪并没有在思想深处将自己与孔子联系起来，并没有孙中山、蒋介石那样的思想自觉，自视为孔子道统传承者。林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不精通，像那个时代许多好读书的军事将领一样，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其观察问题的一个思想资源，但对马克思、恩格斯那些并太容易阅读的著作，不可能理解很多。但是，毛泽东出于自己对中国传统的厌恶，他到了晚年确实对儒家，对孔子，对传统，表现相当决绝。

据北京大学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提供的线索，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殒命温都尔汗后，北京林彪居所毛家湾想必早就被有关部门查抄过不止一次了。两年过去了，突然有人想起林彪的书籍字画。于是，1973年年末，有关部门派“梁效”一千人马又去翻检一过。上万册图书，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笔勾了道道、画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来。十几个人，连查了三次，凑到一块，没有几条。“刘项原来不读书，嗟尔众人，胡为乎来哉！此一时节，只凭匠心巧运，编排出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这个材料指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至于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头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何以要跟古代思想意识挂起钩来？此时的玄妙，郝斌先生表示很难理解，但知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传达：“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外，此时还有一首毛泽东的五言绝句：“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郝斌先生认为，这两首诗才是“批林批孔”的真正源头。至于“梁效”奉命编排出来的那份材料，于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当年一号中央文件发向全国，“这无疑是一道金牌，一场‘批林批孔’正剧由此开罗登场”。^①

这样的高层内幕我当年作为一个小兵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中央文件下发后，报纸杂志铺天盖地都是咒骂孔老二，以及他的孝子贤孙林彪。作为那个时代并不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我其实对孔子，对林彪，对孔孟之道，基本上不懂。好在那时的政治运动重在参与，并不真的要求懂。真懂的，估计也是麻烦，如后来我所知道的梁漱溟，他确实懂，但他说出来的话却不中听，因而也被边缘化。

政治运动就是一个学习运动，我们这些当兵的政治学习除了由指导员、排长、班长领读中央文件，更多时候就是由文化程度稍高的一些士兵读报纸，有时候也让我们写心得，写大字报。我记得我们连队那时驻防瓮桥十四号，那里也是我们的营部，大字报最多时，简直将那个院子所有墙壁都贴满了，有大标语，有小字报，纸张主要是旧报纸，很少有新买的纸张，部队似乎也没有这笔开支。

至于大小字报，以及我们学习的内容，就是报纸上的文章。稍后的说法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说实在的，几十年过去了，抄的内容早就不记得了，但能记得，就是这个运动促使下，我开始接触了中国历史。印象中，我那时用津贴订阅了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以及极负盛名的《学习与批判》等，里面的文章并不全懂，但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至少应该算作职业生涯的准备期。

在批林批孔以及前后学习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

^① 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公众号2016年9月14日。

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中，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细读过张春桥、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读过《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至于《毛泽东选集》以及选集之外的许多著作，也是我们这代自诩为“小知识分子”的床头书，一读再读，尽管许多内容并不懂。

除了用津贴买书、订购刊物，我印象中那时让我最长见识的是弄了一个浙江省图书馆的借书证，每次可以借十本，或更多。这张借书证是与我一起当兵的高中同学弄来的，究竟是怎样弄来的，现在实在记不得了。这个借书证让我开拓了视野，弥补了中小学期间乡村学校的孤陋寡闻。直至我从杭州退伍回家，这张借书证也没有及时退回，我用这个借书证又借了一批书籍回家，又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留给我的另一个记忆是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但在那时却成为一个普遍性运动。我的一位老乡分在团政治部，他那时就参与了章太炎作品整理，好像是《秦政记》《秦献记》。节假日老乡聚会，这位老乡向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当然我并没有听懂。不过，由于我那时也曾去余杭教导队训练，那儿是章太炎的家乡，有了这位老乡的介绍，我那时对章太炎多少有了一点直观认识。这对后来的职业生涯自然具有正面意义。

杭州军营生活留给我另外一个很深的记忆，是对理论的追求。1975年春节前后，毛泽东在杭州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们连负责杭州火车站外围警卫，主要是看守毛泽东的专列。很长一段时间，我主要看守一个固定道口，那个道口差不多总有与我同时值班的一位师傅，是杭州极负盛名的造反派领袖，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每次值班时，都在听他讲那些晦涩理论，我听得晕晕乎乎，他讲得津津有味。具体内容现在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时很陶醉的情形。我后来比较愿意进行一点理论思考，仔细想想，也有这位造反派师傅的影响在。

我应该算是军营理论学习不错的士兵，记得那时南京军区机关报的记者曾到我们连给我照过几张相，至于是否在南京军区机关报上发表过，我不记得了，但这位记者留给我的几张照片，一直被家里妥善保存。我现在能记得的几张确实都是“摆拍”，比如我坐在大通铺上看书，而战友们统统睡觉，今天想想觉得好假，但当时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似乎本就应该如此。

军营生活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假如没有这段生活，我无论如何不会踏入历史学的门槛。那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我们并不懂，我只是凭着一个年轻人的直觉追求知识，追求进步。

在我大约十岁时，一位在海军当军官的姨夫探亲时对我说过一番鼓励的话。他说我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个军官的料。我不知他的这个说法有多大真实性，但这句话深刻影响了我幼小的心灵。那个年龄能记住的事情并不多，而这件事我却一直惦记在心。

入伍之后，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要成为职业军人，一辈子在部队。所以那时不论政治学习，还是军事训练，或者日常生活，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当兵的第二或第三个年头，我曾被推荐上大学，也去参加了考试，并被告知考得不错。但后来并没有去上学，很久以后，一位了解内情的老乡告诉我，被一位首长的孩子或首长身边的人给顶替了。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毕竟人生的路还很远，机会还有。但这件事让我后来思考毛泽东时代许多问题时有了一个参照，“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其实充满着很多人情因素，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76年毛泽东去世不久，特别是邓小平重出后，推荐上大学成为历史，而一个新的制度安排，重回“文革”前的高考，呼之欲出。这是我不得不放弃职业军人想法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复出后，军队不再从士兵中提升军官。这个决定对于我们从农村来的士兵而言，是致命打击，当兵已没有进步台

阶，我和许多准备一试高考机遇的同学、战友，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候安排复员回家。

此外，由于历史突变，新政策让我这种人世不深的青年人很不适应，毕竟先前也算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积极参加者，让我突然改变认识，确实有些为难。而且，我那时受《参考消息》等影响，对他们之前不断渲染的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变局信以为真，像许多吃着地沟油的忧国忧民志士一样，非常投入地忧心毛泽东之后修正主义上台了怎么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毛泽东去世消息时，我正在省委大院站岗，听到那个消息后确实像后来看到的朝鲜情形一样，一代伟人走了之后，活着的人怎么办？在此后的政治学习中，我也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忧心。今天回想自己幼稚到了极点，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的底层人物，竟然操心根本不该操心的事情。我后来在从事研究时虽然一再强调理想社会形态就是各司其职，让政治归政治家，让外交归外交家，让学者专心于学问，让学生专心于读书或花前月下。然而，性格即命运，想到的，说出的，并不一定能做到。很多时候，还是“忍不住地关怀”，越位思考那些本该肉食者谋之的国家大事。

顺流而下：从古史往下读

1977年，我离开了杭州，返回家乡，脱掉军装，继续当农民。三年多军旅生涯，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又回到三年前的起点。

此时，担任大队支部书记的是我小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大概没有读高中，比我早几年入伍，早几年复员。他在部队时，以及后来我在部队时，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相处不错。他先是让我当了大队民兵营长。稍后，遇到“文革”后，大约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招收农民工，我就近水楼台，成为新时期历史上第一批农民工。

那时的农村，并不觉得非常痛苦，只是收入太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因而第一批招工，还是引起了激烈反响。印象中，和我一起去的这一批工人，多少都有点关系，与之前几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一样，纯粹的农民子弟，似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一批农民工直接被送到了宿州以东十二公里处的朱仙庄煤矿。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只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平地上下挖八百米，打出几个竖井，以及井下的巷道。我们单位准确名称叫做“煤炭部第二十九工程处”，领导这个工程处的，是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

印象中，我所在的临涣公社此次招到朱仙庄煤矿的工人有一百多人。与煤矿有关系的，被分派至劳动强度稍低的运输队。更有关系的，只在地面从事一些辅助工作。我那时确实与煤矿没有任何关系，年轻力壮，也没有想去找关系，因而我被分配至劳动强度最大，也最危险的掘进队。掘进队的工作也非常简单，那时的概况现在还记得，就是“打眼、放炮、出矸子、钉道”四个工序。

我在井下整整干了一年，从来没有惜力，没有偷懒，几位老师傅，以及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似乎也很器重我。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这样上班下班，喝酒吃肉，睡觉，日子过得很散淡，下井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恐惧，更没有末日的感觉。不过，朱仙庄煤矿是著名的超级瓦斯矿，安全检查是一点都不敢大意，下井时绝对不允许喝酒，不允许带任何火具或易燃物。朱仙庄煤矿也是国家大型重点企业，管理严格，正规，所以我在朱仙庄一年，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事故。

能够记得的，是一位高中同学，他父亲是我们公社很有声望的大队书记，这位同学早我一年参军，之后我们一起来到朱仙庄。这位同学性格很好，不多话，很幽默。然而无论如何让我们那时都想不到的，晚上吃饭时一切都很正常，这位同学去上夜班，就再也没有回来。一条鲜

活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这是我在煤矿工作两年最深刻的一个记忆，从来不敢忘记。

在这位同学出事前，我就到煤炭部在宿县城里新设的“淮北煤炭技术学校”读书去了。淮北煤炭技术学校是中等专科技术学校，在我进煤矿不到一年时开始在煤炭系统内部招生，组织考试。我那时并没有想着离开煤矿，因而与一些工友一起参加了考试，有幸被录取，旋即入学读书。学时为两年或三年，主要为工程类课程，毕业后回煤矿当技术员。对于许多工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我个人那时也这样认为。

但是，当高中同学出事后，我从学校赶回朱仙庄，帮着他的家人料理后事。这件事给我的震撼至今依然存在。我大约就在那一霎那做了一个影响我全部人生的决定，利用在宿县读书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正式高考，一定要离开朱仙庄，离开煤矿。我再也不要回来了。所以当同学后事料理完毕，我将我的“窑衣”、矿灯、矿靴，一切与煤矿有关的物品全部送给了工友。

我决定参加高考，还有一个激励因素。1978年，我大弟弟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上了大学。他本来可以进更好的学校，但由于没有人懂得怎样填报志愿，第一志愿填得太高没能录取时，第二志愿就很不理想。但我弟弟考上大学对我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我那时只有一个想法，我弟弟能够考上，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返回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就开始了高考复习。

煤炭技术学校本身的课程并不少，特别是课后作业，多为绘图，没有足够时间，根本无法完成。好在同学们都很帮忙，几位交情不错的同学在做作业时顺便帮我描出来一幅。这使我赢得了许多时间。

我们这一代“文革”期间的高中生，即使用心读书的学生，也主要在文科上，对于数理化，对于英语，几乎一窍不通。我那一年复习，几